

【历史学研究】

南朝文化名士张融思想与创作的时代气息

张卫宏

(西北大学文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9)

摘要: 运用文史互参的方法, 将张融的思想行迹、文学创作与所生活的社会背景结合考察, 旨在突出其在南朝文化史上应有的地位。研究认为: 张融融合儒、玄、道、佛的思想特征正是南朝时期儒、玄、道、佛互相融合的多元化社会思潮的典型体现; 其创新的文学理论和创作亦与南齐永明文学变革运动声调一致。

关键词: 文学; 张融(444—497); 南朝; 文化; 创作

中图分类号: B23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7)01-0087-04

Thought and creation of Zhang Rong

ZHANG Wei-ho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Art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Shaanxi, China)

Abstract: Putting the studying object into the big culture background, this paper researches Zhang Rong's thought and creation, and finds that Zhang Rong was of far reaching importance in Southern Dynasties. The author thinks that Zhang Rong's thought that blends Confucianism, metaphysics, Taoism and Buddhism embodied the spiritual situation of the age, and his advocacy that creation should follow innovation and change could be traced to the same way with Yong Ming literature campaign.

Key words: literature; Zhang Rong; Southern Dynasties; culture; creation

0 引言

张融(444—497), 字思光, 生活于南朝宋、齐两代, 其家族背景系魏晋南北朝时期显赫的江东土著世族——吴郡张氏。张融是当时一位在宗教思想、书法、文学等文化诸领域都颇有“孤神独逸”的名士, 其思想同时兼有儒、玄、道、佛四者的影响并融合无间; 他性格乖僻, 个体意识极为强烈, 齐高帝萧道成曾叹为“不可无一, 不可有二”^{[1] 727}; 书法方面, 张融擅长草、隶, 庾肩吾《书品》将其列入下中品; 文学方面, 张融堪称是南齐永明文学变革时期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主张文体应自成特色的观点与当时文坛要求新变的呼声同气相求, 诗赋创作亦显示出戛戛独造的努力, 其集《玉海》标志着中国古代别集有专名

之始。然而, 对这样一位重要的文化名士, 迄今为止学界的研究却甚为寥寥, 仅在一些相关著述中有所提及, 尚无一篇专门论述其人其文的文章, 此实为南朝文化研究中的一大缺憾。有鉴于此, 本文不揣浅陋, 试对张融的思想及文学创作进行一番探讨, 希望能够引起学界对这位东南之秀在南朝文化史上应有地位的足够关注。

1 融汇多家的思想特色

南朝时期社会思想十分活跃, 儒学、玄学、道教与佛教同时并立, 既相互斗争, 又相互融汇, 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构成了这一时期社会思想文化的显著特色。受此社会思潮影响, 当时的大族名士多儒玄双修、亦佛亦道。而这一士林风尚在张融身上则

收稿日期: 2006-12-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3BZW024)

作者简介: 张卫宏(1977-), 女, 陕西西安人, 文学博士研究生。

体现得尤为突出。南朝时随着中央皇权相对于东晋门阀政治的逐步加强,儒学又走上了复兴的道路。宋、齐、梁几代帝王先后通过开设儒学馆讲授儒学、收集整理儒家典籍和选拔通经者入仕做官等措施为儒学的重振创造了诸多有利条件。可以说,儒学作为巩固封建皇权统治的工具,在南朝已基本恢复了它的正宗地位。萧子显在《南齐书》中形容当时的尊儒之风是“家寻孔教,人诵儒书,执卷欣欣,此焉弥盛。”^{[1] 687}而对于世家大族而言,儒家道德又是维系其家族内部人伦亲情的核心纽带。东晋南朝时期的大族无不具有深厚的儒学文化传统。关于儒学,张融虽未留下什么著作言论,但观其平生行事,却可感受到儒家仁义孝悌观念在他思想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南齐书》本传称“融有孝义,忌月三旬不听乐,事嫂甚谨”^{[1] 728}。张融之父张畅在宋义宣之难中曾蒙张兴世、竺超人搭救而得以保全性命,张兴世卒后,张融“著高履负土成坟”^{[1] 728}。张兴世之子张欣时在任诸暨令时犯了死罪,张融上书竟陵王萧子良乞求代为赴死,此事虽未得朝廷允许,但张融衔恩以报的仁义道德确令人感动。对于竺超人之孙竺微,张融常以兄相待,微寒冬丧母,家贫无以葬之,张融亲自前往吊唁,脱下所穿衣物赠为赙资,自己竟披牛被而返。豫章王萧嶷、竟陵王萧子良薨,张融“自以身经佐吏,哭辄尽恸”^{[1] 728}。

作为魏晋六朝时一支主流思潮的玄学,以崇尚“自然”为最高的道德原则。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他又说“夫得是(自然),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3]这种自由、洒脱、任性、超然物外的“至人”在玄风大倡的魏晋六朝成为人们普遍追求的一种精神境界。六朝人物性格特征即为个体意识与独立人格的崛起,名士们能普遍认识和肯定自我价值。《世说新语·品藻》记载,桓温少时与殷浩齐名,常有竞心。一次,桓温问殷浩:“卿何如我?”殷浩说:“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4] 284}至张融,则将这种意识发挥到了极致。张融擅长草书、隶书,“常自美其能”,齐高帝评其书法“卿书殊有骨力,但恨无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法”。对此张融却不以为然:“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常叹云:“不恨我不见古人,所恨古人又不见我。”^[5]对于文学创作,张融亦不肯趋人后尘,时时显示出戛戛独造的努力。他认为只可“师耳以心,不可以耳为心师”,^{[1] 729}即要有自己的创新。史载“融风止诡越,坐常危膝,行则曳步,翘身仰首,意制甚多。见者惊异,聚观成市,而融了无惭

色。”^{[1] 727}无怪乎齐高帝萧道成会“素爱”之,见其常笑曰:“此人不可无一,不可有二。”张融这种对个体价值的肯定,对外在标准(包括权势、名利)的鄙视,对自我的高度张扬,正是魏晋以来的一种自觉意识。

张融在《以门律致书周顒等诸游生》中说:“吾门世恭佛,舅氏奉道。道也与佛,逗极无二。寂然不动,致本则同;感而遂通,达迹成异。”又说:“吾见道士与道人战儒墨,道人与道士狱是非。昔有鸿飞天道,积远难亮,越人以为鳧,楚人以为么。人自楚越耳,鸿常一鸿乎?”^[6]可见,他的思想又有调和佛道的一面。据《南齐书》本传记载,早在弱冠之年,张融即享有声誉,受到同郡人、著名道士陆修静的青睐,赠其白鹭羽麈尾扇,并被目为“异人”。其传又称“融玄义无师法,而神解过人,白黑谈论,鲜能抗拒。”张融在临终时作有《遗令》,要“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1] 729},置儒、道、佛三家经典于一身,精神追求终其一生而不变。

2 戛戛独造的文学努力

《隋书·经籍志》著录张融有别集《玉海集》十卷、《大泽集》十卷、《金波集》六十卷。^[7]堪称一位能文之士。惜乎今存仅余文十三篇、诗五首。值得一提的是,张氏家族在魏晋南北朝时向以“能文”著称。《世说新语·赏誉》记载:“吴四姓,旧目云:‘张文、朱武、陆忠、顾厚。’”^{[4] 268}这是汉晋之间吴地人对当地大姓门风的概括,意为张氏重文词与学术,而不甚重视宦业与事功。验之史传,魏晋以迄南北朝数百年间,张氏家族的代表人物几乎无不能文。

据《三国志》记载,孙吴之世张氏最重要的人物张温“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论议之辩,卓跖冠群,炜晔曜世,世人未有及之也。”孙吴之世的其他张氏人物也擅长作文。如与陆逊等齐名的张敦,史称其“德量渊懿,清虚淡泊,又善文辞”。张敦的两个儿子纯、俨也皆属文,少时便有即席赋诗的文才。张俨的两个儿子勃、翰则显名南北,特别是张翰被列入《晋书·文苑传》,有相当的文学成就,连续三代以能文著称。进入南朝,张氏家族涌现的能文之士仍然层出不穷。如刘宋时期的张永,“涉猎书史,能为文章,善隶书,骑射杂艺,触类兼善。”梁时的张率,“十二能属文,常日限为诗一篇,或数日不作,则追补之。稍进作赋颂,至年十六,向二千余首。”《梁书·张率传》写道:“少好属文,《七略》及《艺文志》所载诗赋,今亡其

文者,并补作之。所著《文衡》十五卷,文集三十卷行于世。”在这种家风的熏陶下,无怪乎张融会将文学视为“不隳家声”的事业而不断创新求变了。张融的文章“文辞诡激,独与众异”^{[1]725},在当时不为世人所理解。但他对自己的创作自视甚高,其《戒子书》云:“吾文体英绝,变而屡奇,既不能远至汉魏,故无取嗟晋宋”。《门律自序》又云:“吾之文章,体亦何异,何尝颠温凉而错寒暑,综哀乐而横歌哭哉?政以属辞多出,比事不羁,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然其传音振逸,鸣节竦韵。或当末极,亦已极其所矣。汝若复别得体者,吾不拘也。吾义亦如文,造次乘我,颠沛非物,吾无师无友,不文不句,颇有孤神独逸耳。义之为用,将使性入清波,尘洗犹沐。无得钓声同利,举价如高,俾是道场,险成军路。”在《门律自序》中,他还讲到:“吾文章之体,多为世人所惊。汝可师耳以心,不可使耳为心师也。夫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政当使常有其体。丈夫当删《诗》、《书》,制礼乐,何至因循寄人篱下。”所谓“耳为心师”,只能是人云亦云,少了自我的创见,而“师耳以心”则强调了自我的主体判断。所以他说文无常体,是要人们不要奉一定的文体为典则,应该有自我的风格。^[8]

南朝时期,文学摆脱了经学与玄学的束缚,强调情性,文学创作日渐繁荣。文学本身的规律如审美价值的创造、艺术技巧的积累、创作理论的探索等等都受到空前的强调,文人普遍具有颇为强烈的创新意识。《文赋》说“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文心雕龙·通变》说“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堪久,通则不乏”。《南齐书·文学传论》中指出当时文学创作的风气是“若无新变,不能代雄”。都反映了自觉地求新求变的意识。上述张融作文当“师耳以心,不可使耳为心师”、“以有体为常”等创作主张与《文赋》、《文心雕龙》在精神上正是一脉相通的,也反映了永明时期文学力求变革的时代呼声,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南朝佛教、道教之风盛行,“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此诗高度概括而又形象地描绘了南朝大兴佛教的盛况。佛教盛行,僧徒颂经,直接影响了“永明体”作者对诗歌创作声律的研究和重视。这是学界的共识。但是,忽视名士们崇尚老庄玄趣的清谈之风,对认识“永明体”的产生也是片面的。著名的南北朝文学研究专家曹道衡先生认为“清谈之风,不但是要谈玄理,还要谈吐有辞采,音韵悦耳。这自然会使人更注意声调的抑扬顿挫,对‘永

明体’的出现,也显然有一定的影响。”^[9]《南齐书·刘绘传》记载:“永明末,京邑人士盛为文章谈义,皆凑竟陵王西邸。……时张融、周顒并有言工,融音旨缓韵,顒辞致绮捷。”可见,崇尚清谈的时代风气对张融的诗歌产生了影响,而张融也为“永明体”的产生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观乎张融的诗文作品,较能体现其个人独特风格的是《海赋》。此赋是他在宋孝武帝时出任交州封溪(今越南境内)令时于海上航行而作,与西晋木华《海赋》在汉魏南北朝十多篇同题赋作中被认为是成就最高的两篇。^[10]他对这篇赋很自负,并有与木华的名篇争胜之意。在序文中,他说:“吾远职荒官,将海得地,行关入浪,宿渚经波,傅怀树观,长满朝夕,东西无里,南北如天,反覆悬乌,表里菟色。壮哉水之奇也,奇哉水之壮也。故古人以之颂其所见,吾问翰而赋之焉。当其济兴绝感,岂觉人在我外,木生之作,君自君矣。”意思是,木华虽然首屈一指,我并不在他面前俯首称臣,而要另辟蹊径,刻意求新。

的确,张赋与其他同题赋作的结构都有所不同,虽然他的篇幅最长,达二百九十三句,却有别于传统汉赋的重在铺陈写物的手法,不着力于海中神话和海上物产,而是基于自己的亲身经历,以浓墨重彩、精雕细刻表现海洋在不同气候条件下的复杂面貌和航海者的不同观察与感受,尤其在用词造句方面刻意求新求奇。例如他形容狂风巨浪造成的波涛汹涌之状:“湍转则日月似惊,浪动则星河如覆,既烈太山与昆仑相压而共溃,又盛雷车震汉破天以折轂”。这样的想象力真是大胆之极,把船在海上颠簸,造成人的观察失去平衡,视觉混乱的印象描绘地淋漓尽致,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太山”与“雷车”两句,在辞赋中是罕见的长句对仗。他写春日风平浪静时的海景,则曰:“柔和丽景,晴云积晖。起龙途于灵步,翔螭道于神飞。浮微风之如梦,落轻雨之依依。”用梦的来去飘忽无定来形容浮云,构思精巧,别出心裁。据说时人顾凯之在见到此赋时,曾对张融说可惜没有写到盐。张融立即挥笔补上四句:“漉沙构白,熬波出素,积雪中春,飞霜暑路”。^{[1]725}

这些信手拈来之笔,比喻新颖,形象生动,遣词造句喜尚奇丽,表明了作者的才思敏捷和为文华美。而他的书信体应用文却另有一番面目。张融因家贫,曾分别写信给从叔征北将军张永与吏部尚书王僧虔申其情累。在给张永的信中,他追忆道:“融昔幼学,早训家风。虽则不敏,率以成性。布衣韦带,弱年所安。簞食瓢饮,不觉不乐。但世业清贫,人生多

待,榛栗枣修,女贄既长,束帛禽鸟,男礼已大。”^{[1] 726}言辞情恳意切,没有华丽的修饰,直是一封朴实的家书。在信的结尾处,张融亦毫不讳言自己求禄的心切,“融不知阶级,阶级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复求丞。”^{[1] 726}而写给吏部尚书王僧虔的信则是另一种风格:“融,天地之逸民也,进不辨贵,退不知贱,实以家贫累积,孤寡伤心,八侄俱孤,二弟顿弱,岂能山海陋禄,申融情累。阮籍爱东平土风,融亦欣晋平闲外。”^{[1] 727}语气不卑不亢,并无寒酸乞怜之态,以大名士阮籍爱东平土风自比,毫不掩饰狂放的个性。

3 结 语

南朝这个中国历史上个体意识开始崛起的时代,造就了包括张融在内的众多文化名流。而张融更以其尤为特立独行之举止,为那个时代树立了醒目的标志。斯人已逝,张融令人注目之气质

风貌已成为历史上遥远的余响,但他注重个人之独立、不惧外在标准之精神在今天却仍不失其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1] 萧子显. 南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
 - [2] 高 亨. 老子正诂[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3] 庄 子. 庄子[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 [4] 徐震鄂. 世说新语笺疏[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5] 李延寿. 南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6] 严可均. 全齐文[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7] 魏 征. 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 [8] 阮 忠. 南朝文化、文学观与散文风格[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 41(4): 87-92.
 - [9] 曹道衡. 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
 - [10] 谭家健. 汉魏六朝时期的海赋[J]. 聊城师范学院学报, 2000, 19(2): 84-89.
-
- [2] 周荫祖. 人的现代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C].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7.
 - [3] 陈立林.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现代化刍议[J]. 玉林师范学院学报, 2003, 19(2): 26-28.
 - [4] 石大建. 人的现代化——社会现代化之魂[D].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 2000.
 - [5] 李建刚. 论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现代化教育[J]. 青海社会科学, 2006, 27(3): 17-20.
 - [6] 英格尔斯. 人的现代化[M]. 陈文成, 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 [7] 朱建成. 论现代化教育与人的现代化[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05, 24(9): 11-13.
 - [8]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 [9] 胡 平. 高等教育与人的现代化[J]. 黑河学刊, 2004, 24(6): 85-87.
 - [10] 陈卫伟. 素质教育与人的现代化[J]. 咸宁学院学报, 2004, 26(2): 120-122.
- (上接第86页)
- 关键在于人的现代化; 而人的现代化则取决于现代化的教育。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的教育, 首要任务是要千方百计地把广大管理干部, 特别是各级各类党、政、企领导干部, 变成现代化的人。而要实现现代化的教育, 就必须不折不扣地落实邓小平同志“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的指示精神, 各级政府从思想认识、政策法规、经费、管理和精力等各方面加大对教育的投入; 各级各类学校把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培养合格的现代化人才置于中心地位; 广大教师通过创造性的辛勤劳动为培养一批又一批的现代化新型人才而尽职尽责。只有这样, 中国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
- 参考文献:
- [1] 李泳梅. 人的现代意义和特征[J]. 现代教育科学, 2006, 23(3): 19-22.